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副编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卷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副编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卷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五至第九部分文章 35 篇

五、闽北游击区

黄道与三年游击战争

黄知真

闽北革命根据地，地处信江以南，闽江以北，武夷山脉北段，闽赣两省的毗邻地区，是连接赣东北苏区和中央苏区的桥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以武夷山为依托，西出江西，北上浙江，东至大海，南下闽中，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它既有秀丽的武夷山区，又有肥沃的建溪平原，盛产粮食、木材、毛竹、茶叶等，素有“福建粮仓之称”，资源极为丰富。

历史上，闽北曾经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1926年，建立了党的组织。1928年到1929年，在党组织和徐履峻、杨峻德、陈耿、徐福元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崇安的上、下梅和铅山的石垄、东坑、车盘等地相继举行起义，创建了以崇安为中心，包括崇安、浦城、铅山、建阳等县部分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五十五团。群众基础深厚，富有革命传统。

1930年，党中央决定闽北、赣东北两根据地合并，组成赣东北省（后为闽浙赣省）。方志敏同志先后两次率领红十军入闽作战，攻克浦城、赤石、星村、石塘等重要城镇，对闽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省委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加强闽北的领导，成立闽北分区委，领导根据地斗争，进行根据地的建设。此时，闽北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独立作战的主要组成部分。

黄道同志是1931年到闽北任分区委书记的。他早年投身革命，中学时代就在南昌二中参与发起组织“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去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参加过著名的三一八运动。大革命时期先后在横峰、南昌领导革命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尔后遵照党的指示，同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一起，领导了弋横起义，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建人之一，担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代理省苏维埃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931年，因为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被排斥出省委常委，调闽北任分区委书记。从1931年到1937年，除在一个短时间到闽赣省委担任领导工作之外，他一直战斗在闽北，为闽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付出了全部心血和精力。

在分区委的领导下，闽北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不断壮大，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从1934年到1937年，面对数十倍于我之强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独立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全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从1934年底到1935年秋，实现了由苏区到游击区的转变；从1935年秋到1936年底，实现了主要是坚持原苏区内线作战到坚持以原苏区为依托，大胆挺进敌后作战的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转变；从1936年底到1937年，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到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闽北党组织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分析形势，作出判断，制定政策，战胜了重重困难，顺利完成了上述转变。不仅保存了革命阵地，保存了革命武装，保存了革命组织，而且还将游击根据地逐渐扩大到包括崇安、铅山、建阳、浦城、建瓯、松溪、政和、屏南、

古田、周宁、寿宁、南平、邵武、光泽、顺昌、将乐、泰宁、建宁、贵溪、金溪、资溪、上饶、广丰等 20 余县的广大地区。

迎接暴风雨

1933 年 9 月，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开始，敌人占领黎川、光泽，建成从江西南城经黎川、光泽，至福建邵武、顺昌、南平的封锁线，割断了闽北苏区同中央苏区的联系。1934 年 10 月，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赣东北苏区，进军皖南。敌人集中第七十六师、十二师、二十一师、五十六师、新编第十一师、独立第四十五旅、“剿匪军”第二纵队和闽赣两省的部分保安团队，共十余万人，进一步加紧对闽北根据地的进攻。而我军只有原闽北独立师改编的红七军团第二十师第五十八团、闽北独立一团、独立二团、红三团和各县独立营、区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总兵力 5000 人左右。到 1934 年年底，敌人凭借优势兵力，构筑碉堡，龟步前进，先后占领了崇安县城和星村、黄坑、石塘、二都桥等城镇；根据地各县陆续转入游击战争，只有以大安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中心区域，暂时还比较安定。

这时，国民党第十二师和独立第四十五旅从铅山和崇安两个方向南北对进，矛头都指向闽北根据地首府——大安。南线，独立第四十五旅向崇安以北的四渡桥猛扑，我分区教导队一部，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碉堡，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依靠红军战士高昂斗志，顽强地阻击敌人。从 1935 年 1 月 3 日到 10 日，经过八昼夜的浴血奋战，给了敌人以很大杀伤，但终因力量悬殊，不得不撤出战斗。随后，敌人继续向我洋庄、路口、小浆一线修筑碉堡，步步逼进。北线，第十二师占领铅山以南的紫溪后，继续向车盘、分水关进犯。

主力红军长征前，党中央决定设立苏区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由项英、陈毅同志统一领导。要求各苏区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积极牵制敌人，以便将来配合中央红军，夺取反攻胜利。

然而，怎样执行中央的指示在原地坚持斗争？分区委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继续坚持“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的方针，先是主张死守四渡桥，以后又主张继续在洋庄、小浆和紫溪岭、车盘等地构筑红色碉堡，“坚决阻住敌人，誓死保卫大安”。

黄道同志回顾中央苏区的广昌保卫战和赣东北苏区的猪头山、赭亭山、老鸦尖之战，我军打得很英勇，但都没有阻止敌人的进攻；而赣东北起义时，红军数量虽少，但依靠人民群众，以游击作战与敌周旋，却能由少到多，由弱到强，建立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想到闽北苏区情况，以 5000 之众面对十万强敌，力量如此悬殊，要死守一地绝难守住，要处处设防将防不胜防。四渡桥一仗，给敌人以大量的杀伤，自己伤亡也不小，最后不得不撤下来。现在我们有一支很能打仗的部队，有一块基础很好的根据地，有根据地中觉悟很高的群众，如在武夷山区打游击，则可以同敌人长期周旋。

经过反复考虑，黄道同志认定大安是守不住的，不但大安守不住，其他重要村镇也将落入敌手。与其同敌人争夺大安，消耗有生力量，不如主动撤出大安，保存有生力量，依靠广大山区坚持打游击战争。

他针对李德胜的观点，严肃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想依靠碉堡，分兵把口，打阵地战来保卫苏区是保不住的。要准备在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都被敌占领的情况下，在武夷山区依靠群众打游击。他还指出：开始的斗争将极其艰苦，经过一段时间，我们逐渐适应了新形势，情况又会慢慢好起来。

他耐心地引导大家实事求是地认识闽北党和红军所面临的情况，作

出正确的决策，得到了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曾昭铭等多数同志的支持。经过激烈争论，分区委否定了李德胜的主张，作出了“主动撤出大安，依靠武夷山，依靠老区，坚持游击战争，保存有生力量，配合中央红军，夺取反攻胜利”的决策。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分区委还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

一、红五十八团在洋庄、小浆一线，阻滞敌人的前进，掩护领导机关的转移。

二、分区各党政领导机关精简机构，清理文件，减少马匹，实行轻装，做好撤离准备。

三、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随军行动。分区党政领导机关随军分区行动，各县成立游击指挥部，县苏主席兼指挥，县委书记兼政委，县级领导机关随独立营行动，各区组织游击队，区苏主席兼队长，区委书记兼指导员，区委、区苏随游击队行动。

四、在可能被敌占领的地方，建立秘密的党团组织。能就地隐蔽的同志就地隐蔽，能转往他地隐蔽的同志转移地方隐蔽，不能坚持隐蔽斗争的同志转入游击队，实行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在敌人占领后，有条件的，还可以争取当保甲长，以应付敌人，保护群众，配合武装斗争。这是赣东北地区曾经用过的，后来被形象地称为“白皮红心”的政策。

因为原来的苏区党、团组织都已公开，有些一时无法找到地方隐蔽的同志，还采取过一些特殊办法。譬如张采姬同志，为了派她回去坚持隐蔽斗争，在撤出大安以前，团分区委曾专门开过一次支部大会，批评她“政治动摇”，宣布“开除党籍”，遣送回家。会后曾镜冰亲自找她谈话，布置了隐蔽斗争任务，秘密发给她党籍证明。她在洋庄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领导群众反抓丁，给红军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食，买物资。后来在一次策动敌人起义时事泄，被敌人砍了13刀，身负重伤。

撤出大安街

按照分区委的决定，分区各机关紧张地进行撤离大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思想动员，分析当前的形势，讲解分区委的决定。各单位都在清理文件，精简人员，实行轻装，除了黄道和李德胜的坐骑之外，其他的马匹统统杀了，机关饲养的猪也杀了。吴华友还特地为大家做了广东菜——烤小猪。

这时，接到中央的电报，记得大意是：主力红军已经突破重重封锁，渡过湘江，到达贵州，中央准备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取得与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密切配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中央红军的胜利喜讯，更增添了同志们的胜利信心，大家高兴地歌唱：

中央红军野战军，
沿途胜利多得很，
已经打到贵州、四川的边境。
会合红四方面军，
创造新的根据地；
彻底粉碎国民党的五次围攻。

同志们还积极响应分区委“每人送敌人一份见面礼”的号召，准备了许多地雷、挨丝炮。挨丝炮本来是福建人民在深山老林里用来对付野兽的土炸弹，现在用来对付两条腿的“野兽”，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撤出大安以前，街道上、房屋内、操场中、菜园里，甚至锅灶下，都装上了地雷和挨丝炮。

我五十八团在洋庄、小浆一线，配合当地游击队、赤卫队，以袭击、伏击、骚扰等方法阻滞敌人前进，在路口设伏，歼灭一个营。

1935年1月25日，北面之敌已接近分水关，南面之敌也进到离大

安十里的小浆，和我们只隔着一个山头。那天晚上，同志们集合在大安对面的河滩上，遥望沉睡着的大安，静悄悄的，只有小河的潺潺的流水声。

就在这时，黄道同志出现在队伍的面前：

“同志们，今天我们就要撤出大安了！”一句话，打破了沉闷的空气，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现在，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地雷挨丝炮也都装满了。敌人占领大安，除了迎接他们的地雷、挨丝炮之外，什么也得不到。从今天起，我们要转入艰苦的游击战争，在闽北老根据地的崇山峻岭中和敌人周旋。我相信，我们将胜利地回到大安，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随后，在一声“出发”的口令下，同志们怀着惜别的心情，告别了熟悉的大安，默默地登上了大安东面的高山。

第二天，我们坐在山上，遥望大安，只见片片火光，团团浓烟，隐约听见阵阵爆炸声。不用说，那是敌人接受了我们的“见面礼”。

撤出大安，标志着闽北根据地全面进入游击战争环境。

分区领导机关撤出大安以后，先驻在道观厂，再驻虹溪，2月初转到长涧源、坑口一线。在这里，接到中央电报，主要内容是：老苏区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要实现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要组织小分队，要有计划地分散活动，环境有利则集合歼敌，不利又分散下去。要紧密联系群众，在群众中站稳脚跟。要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要精简领导机关，派得力干部到地方去加强领导。

学习了中央指示，分区委认为，中央指示完全符合闽北的情况，要坚决贯彻执行；大安会议的决定符合中央指示精神，要坚决执行，依靠群众，依靠山区，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并使各方面的工作都能适应游击战争新形势的需要。同时，作了一些新的部署。

一、为了有利于根据地中心区域独立自主地领导当地的斗争和加强各县的领导，分区委决定成立崇安中心县委，领导大安以东的崇安老区的斗争，曾昭铭同志任书记；将大安西南的崇安、建阳老区划出，成立

西南战区，汪林兴同志任书记，领导这里的斗争。同时，分区领导机关抽调一批领导同志到各县去，如分区苏维埃主席温卿绍同志去邵武，总工会主席吴华友同志到广浦，总工会青工部长王荣森同志到建阳。

二、完善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分区党政领导机关，进一步精简，压缩非战斗人员，充实战斗部队，各县、区党政领导机关也要坚决进行精简，彻底执行轻装，以利于随县独立营和区游击队行动，更加机动灵活，对付敌人“清剿”，打击地主武装，保护群众利益。

三、为使各主力团队更加机动，以分为主，能分能合，分散时能在全分区范围穿插自如，必要时又能集中歼敌，决定重建闽北独立师，黄立贵任师长，卢文卿任政委。下辖四个团：以五十八团两个营为基础组建一团，闽北独立一团为基础组建二团，五十八团一个营和分区直属机关精减的人员组建三团，独立二团为基础组建四团，全师 3000 人。1935 年 2 月 12 日，闽北独立师宣告成立，2 月 14 日各团即按计划分散活动。黄立贵、曾镜冰同志率一、三团到江西铅山地区，二团留在崇安、广浦地区，四团去建阳、邵武、光泽地区，配合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独立师各团分头出发，分区委对崇安、广浦地区的工作作了部署后，率领导机关由崇安出温林关，到江西铅山，准备在铅山活动一个时期，再转移到建阳、邵武、光泽地区。

第一个考验

分区领导机关到达铅山县境，经下渠、车盘转到篁村。黄道同志在篁村召集李德胜、黄立贵、曾镜冰、王助和铅山县委书记黄怀仁研究当前形势，决定放弃石堽，黄立贵、曾镜冰同志率第一团和三团两个营到资（溪）光（泽）贵（溪）地区，第三团一个营继续留铅山，背靠武夷山，

在闽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

就在这天下午，从一张上海的《新闻报》上，看到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和方志敏同志被俘的消息，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晚饭时，黄道同志一再叮嘱黄立贵同志，形势可能会更严重，活动也将更困难，要有这个精神准备，下决心使自己的思想行动，尽快适应新形势，到资光贵后，要随时注意掌握情况，或留资光贵，或到邵顺建，或去建松政，你们可视情况变化自行相机决定。李德胜则拍着胸膛说：“没有问题，就是战到最后一个山头也能坚持。”他表面上似乎很勇敢，心灵深处却想到了“最后一个山头”，流露出惶惶不安的悲观情绪。

当晚，黄道同志久久不能成眠。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想到多年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断轻轻呼唤着方志敏同志的名字，串串泪水夺眶而出。我坐在他身边，安慰他说：“爸爸，不要听敌人那一套。国民党就会吹牛，今天说抓住了这个，明天又说抓住了那个，他们不是也多次说过抓住了你吗？其实谁也没有给抓住，这次肯定又是在吹牛。”他摇了摇头，神情庄重地说：“你不懂，这次可能是真的。赣东北的情况已不同当年了。”接着又说：“从早期革命活动到赣东北起义，志敏、式平和我，都是亲密的战友，共同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现在志敏被俘，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赣东北人民失去了敬爱的领袖，当然悲痛。但是，更重要的是今后我们的担子更重了。”

第二天，我们转移到离篁村15里的东坑，敌人随后进了篁村。下午，李德胜对黄道同志说，他打算到前面去看看情况。黄道同志同意了，并且叮嘱他多带些人，注意安全，早点回来。谁知他只带了一个参谋和一个警卫员。出去不久，警卫员押回一个篁村出来“打鸡子”的俘虏，说：“司令员还要到前面继续侦察。”晚饭前，参谋也回来了，说是快到篁村时，司令员要他先回来汇报情况：“敌人已在篁村宿营，司令员还要到前面去看看。”还带回了李德胜的一件皮革大衣。

从这天下午起，黄道同志一直坐在火炉旁，一边吸烟，一边沉思，

回顾李德胜种种不正常的行径，估计很有可能叛变投敌。

吃过晚饭，仍不见李德胜回来。为防不测，黄道同志提笔亲自给黄立贵、曾镜冰、吴先喜、曾昭铭等同志写信，通知他们今后司令员的命令，都必须有政委署名，否则一律无效。信写好了，派人送出去了，时间已近子夜，还不见李德胜的影子。黄道同志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尽管外面浓云密布，大雨倾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出命令：立即向桐木关方向转移。

雨夜行军，道路泥泞，山陡路滑，沿途多是年久失修的独木小桥，加上当时我们的无线电台又十分的笨重，一路上走走停停，走的时间还没有停的时间多，20多里的山路，足足走了半夜，拂晓才到达桐木关。这里海拔1700多米，春寒料峭，晨风吹在身上，透过汗浸雨淋的湿衣服，使人感到既累又冷。

刚到桐木关，后卫传来发现敌情的报告。黄道同志明白，原来的判断已得到证实，最坏的情况出现了。他命令教导队留下一个排掩护，机关迅速向三港转移。在离桐木关五里左右的一个小村边遇到吴先喜、温卿绍、彭喜财同志，原来他们率领四团，正在三港一带活动，得到消息特地来迎接我们。黄道同志高兴地说：“你们来得正好。”随即简单地向他们说明李德胜已经叛变，正带领敌人追击我们，并指示他们立即派专人带电台转移到安全地带，其他问题到三港再作研究。

到了三港，电台队继续前进。我们刚刚坐下，还没喝完一碗茶，后山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教导队同敌人打响了。吴先喜第一个走出大门，同温卿绍、彭喜财一起率领四团抢占阵地阻击敌人，掩护分区领导机关转移。

黄道同志带领我们走出三港村口，沿着电台队转移的路线，向左边山沟没走多远，前面又响起了枪声，是电台队同敌人的迂回部队遭遇了。黄道同志向四面观察了一下，沉着地指挥大家沿着右边的山沟，利用梯田形成的死角，冲出包围，到对面山上集合。队伍冲出来了，也冲

散了。

敌人在三港停留了三天，天天出来搜山，李德胜天天跟着敌人出来，拉开嗓门喊话：“我就是李德胜，你们出来投降吧，保证生命安全。”尽管他喊破了喉咙，却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第四天，敌人撤走了，部队陆续回到三港集合。

事后了解到，李德胜叛变以后，从篁村带着敌人一个主力团，轻装追击我们。

这一仗，是一个胜仗。敌人的追击、包围没有达到消灭我们分区领导机关的目的。叛徒李德胜的喊话也没有叫走一个人，大家都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考验。这一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几次轻装以后，剩下的一点坛坛罐罐统统丢光了。敌人回去时，东坑附近的后方医院也受到了损失。最令人痛心的是，无线电台队同迂回之敌遭遇，因为机器过于笨重，突围时无法抬走，只好忍痛将它砸烂，推下山沟，从此完全失去了同党中央的联系。

李德胜虽然到闽北时间不长，在干部、战士和群众中的威望不高，但他毕竟是司令员，他的叛变不能不在红军指战员和群众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及时消除这种影响，分区委决定：撤销李德胜分区司令员职务，永远开除李德胜的党籍，在干部、战士和群众中公布李德胜的罪行。同时，任命吴先喜同志为分区司令员。

黄道同志宣布了分区委的决定，作了长篇讲话，还亲自为部队编写了一首《骂李德胜歌》歌词是：

李德胜，真混蛋，
敌人进攻他就慌张。
借口探敌情，
公开去投降。
带了敌人追击我们到三港，
贪生怕死最可耻，

拖枪投敌黑心肠。
红军战士真坚强，
见了叛徒就开枪。
反革命的阴谋全部破产。

李德胜，真可耻，
背叛革命去投敌。
不做革命人，
宁做反动鬼。
向着敌人打拜磕头无廉耻。
参加革命要坚决，
为何半路去反水？
人人骂你是反贼，
一世头都抬不起。
这样的人生不如死。

同志们，不要惊，
革命好比火炼金。
真金不惜火，
怕火非真金。
一切杂质一经火炼现原形。
革命同志心如铁，
任何艰苦不变心。
为着工农的利益，
不顾一切的牺牲。
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教育，同志们的胜利信心更坚定了。在此基

础上，分区领导机关又进行了一次整顿，进一步实行党政军领导机关一体化。各县、区党政领导机关同独立营、游击队也更加合为一体。

艰苦的岁月

经过三港整顿，分区领导机关转移到大安西南的溪源、浆溪一带。这时，敌人在根据地内的主要封锁线已经建成，一面继续加紧构筑碉堡，扩展封锁线，一面疯狂进行分区“清剿”。我们在双溪口，发现敌情，转移到北坑，敌人随后进占双溪口。

北坑，距离双溪口约20里，在武夷山主峰黄岗山的东麓，是一条长长的大山谷。这里奇峰峭壁，曲涧飞瀑，茂林修竹，景色秀丽。崎岖蜿蜒的山间小道，串起四个小村庄，加在一起只有几户人家。因为这里地形险峻，只有通向双溪口的一条小路。敌人很难进来。然而敌人驻守双溪口，我们也不易出去。

这时，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我们每个人携带的一点粮食吃不了几天，群众也没有余力支援我们，大家只能节省着吃。记得有一次五斤米做了100多人的“稀饭”，清可见底，一碗粥也捞不到几颗米粒。粮食越来越少，就上山挖蕨根、竹笋和苦叶菜、糯米藤之类的野菜补充，黄道和吴先喜决定尽快转移出去。但路口有敌兵把守，有位老人说30多年前有人从小路翻过黄岗山，走50里能到江西。循着这条线索，派人寻找了几天，路的影子也找不到。吴先喜同志说：“找不到路，就砍出一条路走。”可在深山密林中，开路谈何容易！一个排砍了几天，还砍不到三华里。

然而时不待人，粮食早已吃完了，蕨根野菜也越来越难找了，同志们饿得浑身无力，站着想坐，坐下想躺，躺下就不想再起来。黄道同志下了决心：从双溪口冲出去！